

# 書 評

## Reviews

*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By Jack W. Chen. Cambridge, MA: Harvard Asia Center, 2010. Pp. xvii+445.

田曉菲，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教授

在中國歷史上，身後有大量詩作傳世的帝王可以說屬於少數，而其中以能詩著名的帝王更是寥寥可數。唐太宗李世民的現存文集裏有一百餘首詩賦，由數量上而言，在初唐詩人中可以算是相當突出的。但是在傳統文學史上，以宮廷詩爲主的初唐詩向來沒有受到充分的重視，太宗的詩作在初唐詩中又非出類拔萃，因此，唐太宗的詩名在文學史上一向不響亮。然而，在同時代的詩人當中，且在能詩的帝王裏，唐太宗實可謂佔據著一席饒有趣味的位置。首先，他身爲北方人，卻採取了被征服的南朝宮廷的詩風。在這一點上，唐太宗和隋煬帝頗爲相似。但和隋煬帝不同的是，太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君主，君臨統一的帝國二十三年，開創了大唐盛世，史稱「貞觀之治」。這樣一位擅於治國的君主，卻又對作詩如此感興趣，在清朝的乾隆皇帝之前，可說是絕無僅有。這裏的問題是：皇帝爲甚麼要寫詩？皇帝的詩，除了作爲宮廷生活的點綴之外，是否具有任何更爲深遠的政治和文化意義？皇帝的詩作爲「詩」，又是否值得後代研究文學、文化和歷史的學者多加關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陳威教授，在本書中，以豐富翔實的資料，成熟靈活的理論運用，敏感銳利的文本細讀，對這些問題作出富有創造性和啓發性的思考。

在《唐太宗的君主詩學》裏，作者開門見山地指出，本書的主旨不是對太宗的統治進行歷史敘述，而是探究太宗如何以其文學作品表現他的統治。全書通過對唐太宗的詩文及其歷史傳統和當代語境進行分析，探討太宗如何建構自己的明

君形象。作者特別強調不能把唐太宗的詩作視為簡單的政治宣傳品，因為太宗在作品中塑造自己形象的同時，也在塑造現實中的自我。換言之，太宗通過詩歌想像自己的統治。只有在詩歌中，在這種想象的行為中，那些歷史的缺憾——包括太宗本人以暴力取得皇位的事實——才得以糾正。

值得注意的是，太宗選擇了一個特殊的表現手段：詩歌。太宗的選擇，和六朝與初唐時期興盛發達的宮廷文化有緊密的關係。換句話說，只有當宮廷是帝國的文化生產中心，而詩賦（尤其是詩）是這一文化生產中心之主要價值的流通方式時，帝王的詩作才有可能產生廣泛的文化與政治意義。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詩歌是危險的媒介：它不是透明的載體，而擁有自己的傳統，自己的慣用意象和修辭模式。因此，對於一個寫詩的皇帝來說，其君主身分既受到歷史上帝王格範的制約，也受到其表現手段，亦即詩歌話語本身的影響。更進一步說，詩是抒情主體個人化的表達，宮廷詩卻偏偏要求抹煞個性。另一方面，帝王既是最有權力、自我意識最膨脹的個人；卻同時也是（至少在理論上）最應該沒有個性的個人，因為在一個明君身上，私人的欲望和愛好必須臣服於君王的公眾角色。作者在太宗的詩裏，注意到身為皇帝的詩人與宮廷詩這一媒介之間的張力，也注意到皇帝角色和詩人角色之間的扞格，對之提出了發人深思的見解。

文學批評家或者受到「詩言志」的傳統詩學觀念影響，或者採用現代人的文學定義來衡量中古的文學現象，對宮廷文學一向持輕視態度，因為宮廷文學的寫作總是發生在公共社交場合，以「優雅」為標準，缺乏強烈的個性和個人風格（在宮廷文化環境中，我們無法想像類似孟郊、李賀這樣的詩人存在）。同時，宮臣撰寫的文學因為充滿對君王的稱頌，又往往被視為「歌功頌德」的裝飾性文學。這樣的觀念，使我們無法用歷史性的眼光看待中世文學，無法理解以宮廷為中心的早期中世文學的歷史特殊性。另一方面，歷史學家又常常在「以詩證史」之際，把文學作品當成簡單和透明的媒介，忽略了文學自身的複雜性和能動性。作者關於唐太宗君主詩學的論述，向我們顯示了文化生產領域和政治領域乃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也顯示了中世宮廷文學，尤其是宮廷詩歌創作的潛在文化和政治意義。

全書共分七章。第一章〈閱讀太宗的統治〉(Reading the Reign of Tang Taizong (r.626-649))，以《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幾種史料對唐太宗的記述和《大唐創業起居注》、《貞觀政要》進行對比，分析歷史書寫對太宗統治的表現，以及太宗本人意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如太宗對起居注所表現

的強烈興趣，以及對「玄武門事件」記述的直接干預。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太宗對歷史書寫的干預一事也被載入史冊，而且以正面筆墨出之：太宗以周公誅管蔡、季友鳩叔牙自比，要求史官對玄武門事件「直書其事」，不要「語多微文」。太宗顯然意識到「微文」指向掩藏，只會引起多方猜測；「直書」反而不給讀者留下想像空間，從而杜絕流言。太宗對修辭策略的敏感，凸顯了歷史書寫缺乏透明度及其人工造作的特點。

在本章中，作者指出太宗從諫如流的形象是「貞觀之治」的重要因素，而在這一形象的塑造過程中，魏徵可謂關鍵人物，雖然魏徵既不是太宗最有影響力的大臣，和太宗的關係也並非最為親密。在這裏，陳威使用了「勸導場景」(scene of instruction)一詞(頁35)，描寫史傳裏常見的太宗敘事範式，也即「太宗有失——臣下進諫——太宗納諫」，我以為這很能說明歷史書寫的文學修辭性質。「勸導場景」本是先秦子書中常見的修辭模式，魏徵在這些場景裏的出現，幾乎可以說是出於修辭的需要。換句話說，魏徵需要一個像太宗這樣的君主來圓滿自己「諍臣」的身分，太宗也需要一個像魏徵這樣的臣子以完成自己從諫如流的形象。魏徵對太宗的意義，就好像惠施對於莊子的意義，君臣彼此配合默契，上演了一齣明主賢臣的劇目。當然太宗和魏徵在歷史現實中很可能的確如此忠實地扮演各自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認識到歷史書寫就和所有文字表現一樣，也會遵循一定的修辭習慣。

扮演預定的角色未必意味虛偽和作假。在第二章〈君權及其表現〉(On Sovereignty and Representation)中，作者指出太宗著意塑造自我形象，不僅只是為了給旁人看，也反映了他對自己的期待。換句話說，太宗在文字中建構的自我形象正是他的理想人格。這一章首先檢視了君權概念在中國歷史上的傳統，因為這是太宗所繼承的君主體制的理論基礎；之後，對太宗分別作於貞觀初年和末年的《金鏡》與《帝範》，兩部闡述太宗君主理念的作品，進行了具體的探討。「身體」的意象在太宗的寫作中頻繁出現。通過一系列精彩的文本解讀，作者揭示了君主的私人身體(body natural)和君主所代表的國家政體(body politic)之間的張力。君主是國家政體的腹心，但太宗認識到這個比喻裏「腹」與個人口腹欲望之間的危險關聯，聲稱作為君主，「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頁79，引自《貞觀政要》)。因此作者強調，太宗特別注意君主個人身體及其欲望的控制，如果不是在行動上，至少是在理論上，尤其在文字表現的層次。

從第三章開始，作者轉向對文學的討論。此章前半，檢視了唐前文學傳統對文學與政治關係的探討，列舉的文本有《尚書·堯典》，《左傳》，《毛詩大序》，曹丕的《典論·論文》，裴子野(469-530)的所謂〈雕蟲論〉，以及隋文帝時李諤抨擊南朝文風的奏章。此章後半則以初唐史家編寫的《隋書》、《晉書》〈文學傳序〉以及太宗本人對文學的意見為中心，分析太宗朝對文學的認識，提出在太宗的時代，文學與君主統治之間的關係較前代更為複雜，文學在君權的建構和維持中起到直接作用，初唐的宮廷在太宗影響下，竭力營造一種可以結合南北文化實踐、反映帝國大一統狀況的新文風。本章結尾，分析了太宗親筆撰寫的《晉書》〈陸機傳論〉，指出太宗之所以在眾多晉臣中特意為陸機的傳記撰寫總論，感嘆陸機的悲劇命運，是為借此誇耀自己作為政治領袖和文學領袖的卓越，暗示陸機的不幸正在於沒有遇到象太宗這樣一位可以賞識與護持文學才能的君王。

李諤的奏表，顯然是為了迎合對文藝不感興趣也缺乏才能的隋文帝的口味；而裴子野的所謂〈雕蟲論〉，實乃節選自他在蕭齊時代撰寫的史書《宋略》，正因劉宋王朝已經覆滅，裴氏才敢於對前朝帝王所倡導的文學風氣多所批評，點出「大明之代，實好斯文」（「大明」是宋孝武帝年號，因孝武帝愛好文義，故此上行下效，形成風潮），並申言「亂代文章匿而彩」。換句話說，裴文是具有歷史針對性的議論。本書稱之為對「南方詩風」的批判（頁 118），並把它作為唯一的南朝文本範例來展示南朝對文學與政治關係的理解，似乎難以全面地展示「文」對於南朝君臣的重要性。事實上，本書作者也曾指出，與北朝對立的南朝總是強調江南才是「漢文化記憶和文學生產的合法場所」（頁 118）。這正說明我們不能把南朝君臣對「文」的重視，簡單地視為聽政餘暇的消遣。而且，從這一點看來，唐太宗對文化事業的積極提倡、及其對南朝宮廷詩歌風格的承襲，可以說是作為北人的太宗對南朝文化策略和文化資產的佔有與挪用。當我們在這一語境裏檢視太宗的〈陸機傳論〉，或可從另一角度解讀太宗對陸機的興趣。陸機是南人，出身孫吳名門，晉滅吳之後，陸機與弟弟陸雲在故里隱居十年，才前往北方的洛陽出仕。陸機的遭遇，在北人統一天下的隋唐王朝，想必可以引起很多共鳴。太宗的朝臣裏便有很多是南人，太宗對陸機兄弟「銜美非所」、「智不逮言」、終因捲入西晉諸王的權力紛爭而喪身的感嘆，大可視為對這些朝臣的委婉告誡。而太宗對陸氏家族「三世為將、鬻鍾來葉」的評論，似乎暗示陸機應該以文立身、「居安保名」，這與太宗在唐王朝創立後致力發展文化的傾向也正相契

合。

第四章〈中國中古帝王詩寫作〉(The Writing of Imperial Poetry in Medieval China)，檢視了太宗所繼承的文學遺產，亦即唐前帝王詩人的作品。第五章〈宮廷詩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Court Poetry)，探討宮廷與詩歌的關係。在這兩章裏，作者提出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觀點：「太宗的真正文學成就，也可以說他的獨特之處，在於他認識到，詩歌作為公共文本，可以顯示君主的自我塑造和表現」（頁 190）。作者認為，初唐詩不是南朝詩的簡單延續，因為「在初唐，特別是在太宗的治下，詩的地位經歷了重要的改變。在南朝宮廷，詩與公眾關懷的領域脫節，而太宗的詩卻顯示出他對詩歌的公眾層面以及對恢復漢儒文學意識形態的興趣」（頁 212）。南朝宮廷詩與公眾關懷的領域脫節這一說法未免有些極端，但如果說南朝帝王的寫詩活動在很多情況下只不過是當時盛行於貴族階層的賦詩活動的延伸，那麼在他的相當一部分詩作裏，唐太宗確實展現了強烈的君主意識。換句話說，太宗自覺地把詩作為君主統治機制的建構手段進行操縱，自覺地用詩塑造自己的聖明君主形象，這在前代寫詩的帝王中是十分少見的。這是本書一個重要的見解。

這兩章的論述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處。第四章在引言中說，本章旨在分析太宗所繼承的帝王詩寫作傳統，因此提供了一份唐前詩人皇帝的譜系。作者列舉的詩人皇帝包括漢高祖、漢武帝、魏文帝曹丕、南朝的三位詩人皇帝（梁武帝、梁簡文帝蕭綱、陳後主）、周明帝、隋煬帝。在探討梁武帝父子和陳後主的時候，作者所舉的詩歌例子分別是蕭綱的〈被幽述志〉，梁武帝的〈江南弄〉，和陳後主的〈玉樹後庭花〉。作者指出〈被幽述志〉是唯一可以確定寫於蕭綱即位之後的詩作，但並非他的典型之作，梁武帝的〈江南弄〉才是與蕭梁王朝在文學史上的形象相符合的帝王詩。在〈江南弄〉一詩中，皇帝在「窺視和欣賞一個孤獨宮女的痛苦」，「君主的聲音被女性的悲傷與欲望的美學所替換」（頁 177）。

此處作者對〈江南弄〉的君主話語解讀，建立在第一句詩「眾花雜色滿上林」對「上林」的指稱上，並因此把詩的最後兩句，「中人望，獨躑躅」，理解為孤獨徘徊的宮人。然而在〈文苑英華〉裏，「上林」一作「山林」。至於「中人望」，繫於枚乘名下的〈梁王菟園賦〉中采桑婦人作歌云：「逢嘉客兮不能歸，桑萎蠶飢，中人望柰何。」在江淹的〈學梁王兔園賦〉中，「大夫之徒」道遇「邯鄲之女」，女歌云：「見上客兮心歷亂，送短詩兮懷長歎。中人望兮蠶

既饑，躑躅暮兮思夜半。」武帝〈江南弄〉除了「中人望」之外尚有「連手躑躅舞春心」的句子，與江淹此歌遙相呼應。此外，考慮到〈江南弄〉和聲云：「陽春路，娉婷出綺羅」，我們大可以把這首曲子理解為對採桑女的謳歌，而不是上林苑中皇帝對宮人的窺視。

這裏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唐太宗本人所接受的蕭梁帝王詩傳統，和「蕭梁王朝在文學史上的形象」，恐怕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南朝詩的「陰柔」形象，本身就是初唐史官的建構，本書作者在分析南朝帝王詩時，似乎正是按照這樣的建構做了有選擇的檢視。然而，梁武帝文集多達一百二十卷，唐初猶存二十六卷，唐太宗所能閱讀到的武帝詩作遠比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多得多。即使是在梁武帝少量的現存詩篇中，也有數首可以斷為即位之後的作品，如四言〈贈逸民〉是一首君王口氣的求賢招隱詩，〈宴詩〉歌詠講武宴，〈藉田〉描寫身為君王親行藉田之禮的過程（這幾首詩蕭綱都有同題應詔之作），以及〈撰〈孔子正言〉竟述懷〉，內容如題。這些詩作無不體現了武帝作為君主的關懷，和傳統文學史中所描述的「南朝宮廷艷詩」大相逕庭。它們都保存在初唐宮臣修纂的類書或選集如《藝文類聚》、《文館詞林》中。以梁朝宮廷詩在初唐的流程度和太宗對帝王話語的強烈興趣來看，唐太宗對梁武帝父子的詩作應該相當熟悉，在接受前朝帝王詩的時候，這些詩想必成為太宗最直接的範式之一。

在書寫文學史時，選擇的力量是巨大的。本書第五章在分析一組以雪為題的南朝詠物詩時，舉蕭綱一首詠雪迴文詩為例，意圖說明從五世紀的鮑照到六世紀的蕭綱，詠物詩本身也發生「物化」，從充滿道德象徵意義的倫理寓言，變成「技巧的對象」，展示了一種「植根於物而不是植根於人的詩學」（頁 227）。然而，蕭綱留下約四十首詠物詩，其中三十餘首歌詠自然現象（這一點與現存唐太宗詠物詩以描寫自然景物為主是一致的），只有一首是迴文，也即本書列舉的〈詠雪〉。如果我們只看這一首詩，自然會得出蕭綱的詩缺乏性靈、注重文字技巧的結論，但這不能概括蕭綱詠物詩的整體，就好像在對待太宗詩作時不能以偏概全，把他的一些宴會賦得、流連體物、缺乏帝王關懷的詩篇視為代表作一樣。這裏還需要指出，在南朝宮廷詩裏，一個主要的描寫模式是「觀看」，而任何觀看都隱含著一個觀看的主體。這個主體抒發情懷的手段，不是直截了當地告訴讀者「我有如下思想或感受」，而是通過描述眼中所見，間接地傳達心中所思所感。在蕭綱的詠物詩裏，自然之物不是類型化的物，而是處於具體時間地點的詩人眼中所見的特定之物。如果認為南朝後期的詠物詩本身也被「物化」，反倒抹

煞了詩中觀物主體的存在。

本書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別討論君權的空間象徵——宮殿，以及君權的時間象徵——儀式，特別是具有重大政治文化意義的封禪儀式。第六章追溯了唐前文學尤其是「賦」這一文體對宮苑的表現，以及非文學寫作中的宮室話語，最後以對太宗〈臨層臺賦〉的分析作結。〈臨層臺賦〉繼承了賦文體「曲終奏雅」的修辭傳統，開始時描寫宮室的華美，最終否定宮室，因為宮室的營建意謂著帝王欲望的膨脹和國家的耗費。

「曲終奏雅」的修辭格式也出現在太宗最著名的組詩〈帝京篇〉裏。第七章的獨特之處，在於以太宗的封禪情結為背景探討〈帝京篇〉（〈帝京篇〉最後一首的尾聯，「廣待淳化教，方嗣云亭響」，表現了太宗對封禪的嚮往之心），不僅為這組詩構造了一個豐富的當代政治文化語境，而且以本書作者所特有的敏感銳利的眼光，對這組詩作出了精彩紛呈的文本解讀。這裏唯需提到，如果作者能夠對南朝帝王詩多加注意，可能會給文本分析帶來更多的層次感。比如〈帝京篇〉其三描寫講武宴，梁武帝、蕭綱都有相同題材的作品。梁武帝〈宴詩〉殘篇稱「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用《論語·子路》「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之語，表現出強烈的君主意識。更值得注意的是，蕭綱〈和武帝講武宴〉其一有道：「車書今已共，願奏云亭儀」，直接提到封禪大典，和太宗詩構成了很好的參照。

作者指出，太宗的〈帝京篇〉旨在表現皇帝克服誘惑，但同時也不免顯示了皇帝的各種欲望，詩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反映了自我，從一個意料不到的側面印證了「詩言志」的經典定義（頁 375-376）。換句話說，皇帝的新詩旨在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理想）人格，但是卻在無意中暴露了真身。太宗的詩，的確不是簡單的政治宣傳品，但其實政治宣傳品，尤其是成功的政治宣傳品，從來都不簡單，因為任何宣傳都必須依靠語言或視覺符號的媒介，而語言與視覺符號本身具有的多重意義，往往構成了與作家意圖發生創造性衝突的潛文本。太宗的〈帝京篇〉甚至可以說是政治宣傳品中最成功的一種，因為它展現了帝王的人性弱點，因此也就更具有吸引力和號召力。歸根結底，唐太宗的詩，是作家的個人主體、政治身分與詩藝不斷進行交涉的動態空間，不僅在中國歷代帝王當中，而且在早期中古時代詩歌史上都別具一格。作者關於太宗詩的專著，為讀者展現了一幅初唐宮廷文學和文化政治的多彩畫卷，填補了文學史上的一個空白，不僅是對中古文學史的貢獻，也對文化史和歷史研究者具有重大的啟發。

***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 By Christopher M. B. Nug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Pp. x+341.

Severina Balabanova, 保加利亞索菲亞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This monograph by Prof. Christopher M. B. Nugent identifies and explores an important subject – the production, the textual circulation and the change in manuscript poetic texts in Tang dynasty China. It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introduction, conclusion, appendix, works cited and index.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the author is the concern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ow Tang poetry was “composed, experienced, and transmitted” (p. 1), Tang poetry we actually read today, and what implications this fact has for the field of literary criticism.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unless we situate Tang poems in their “particular cultural and material contexts” in which they were composed and circulated, we run the risk of not being completely able to judge their value and meaning. These concerns are further strengthened by the fact that, unlike Western philological tradition, scholarship on Tang literature has not yet fully elaborated methods and theories regarding manuscripts and orally-based material (p. 4), and Tang poetry-related studies on the subject are brief with only a few exceptions (p. 2). Thus justified, this monograph proposes to make a contribution from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Altogether, throughout this balanced and clearly structured monograph, the author’s propositions are sound, the arguments are derived from well-chosen primary sources, and the conclusions open the door to a re-consideration of some established notions on how we perceive and analyze Tang poetry.

In the introductory part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goal of the study in several places – “to redirect our attention to the original contexts of poetry during the Tang and shed new light on questions of materiality and authorial control in particular” (p. 4), “to shed light on the material lives that poems led during the Tang period, from their initial oral or written instantiation through often the lengthy and twisted paths of circulation” (p. 15). In pursuit of this goal, he concentrates on how people in the Tang composed poetry and how the poetry reached people, the main discussion, therefore, begins on questions of materiality and process (p. 15).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the author makes use of a variety of sources – “official histories, poems, Tang prefaces to Tang collections and poems, and anecdote collections from both the Tang and Song.” (p. 23). In this part on pages 4-11 he also reviews some Western textual criticism scholarship (approaches and methods) on ways to deal with “European texts before the (Western) age of print” (p. 4) in the hope that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is scholarship could be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poetry in the Chinese case. Although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behind medieval European manuscripts differs from that in Tang China, “the technology of manuscript productions and the realities of hand-copied texts resulted in a number of important similarities” (p. 14) which

presuppose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se methods to reading and studying Tang poetry. In the introductory part the author also gives an outline of the content of the each chapters (pp. 18-22) and the limitations of his study (pp. 22-26).

Chapter one is devoted to the examination of poetic manuscripts – of the longest remaining Tang poem “Qinfu yin” 秦婦吟 (“Lament for the Lady of Qin”) by Wei Zhuang 韋莊 (836-910) and of some shorter poems by the poet Gao Shi 高適 (716-765) that have survived and reached us through the Dunhuang version. Through a careful and elaborate analysis of the variations in them the author’s purpose is set at reconstructing a way in which Tang poems were possibly created and changed in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The analysis in this part is complemented by the appendix (pp. 297-309) which consists of a systematization of the eleven types of variations in different versions of “Qinfu yin” manuscripts. This first chapter could be read together with the appendix. The attention in this chapter is directed towards the materiality rather than the content of the poetic works, towards the life of these poems as specific material objects, not as intellectual products. The chapter itself is subdivided into several parts. The author begins by examining several manuscripts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dates and the copyists of the “Qinfu yin” and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are substantial variations between most of them (p. 38). He then proceeds to analyze the formal variations between sets of manuscripts (pp. 39-48). The scholar meticulously describes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nuscripts — sizes, calligraphy styles, punctuation variants, as well as the text marks, and corrections. He argues that these differences define different reading experiences (p. 46) and that they are also an indication of the reasons why the manuscripts were copied (p. 47). After this preliminary descriptive part in order to show how the texts changed over time, the author examines in detail the types of variations in the manuscripts of the poem by comparing pairs of texts.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includes an explanation about the variations, and also some suppositions as to their meaning in the circulation process. I find this part to be particularly useful and inspiring, as it also imagines possible “connections between variants, whether they exist through sound, shape, or meaning” (p. 58) which in itself helps us to have a more precise idea of the actual process of copying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texts.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chapter the author discusses six shorter works of the High Tang poet Gao Shi, all preserved in two copies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Here the author follows the same analytic pattern as for “Qinfu yin”.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s of the chapter in introducing a process of altering, corre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a given literary work could perhaps be enhanced if “Qinfu yin” as well as Gao Shi’s six pairs of poems were translated wholly in the appendix. In addition, this part of the research would gain more clarity if a few more examples for the variants in Category 3 (pp. 55-56) (graphically similar but with different pronunciation) were provided, as this category appears to be a frequent and complicated one. One of the hopes the author stated in the introduction, that the findings of the monograph could relate to the ways scholars of religion approach Tang materials (p. 23), I would suppose that a brief reference to, for example, some similar copying and translational practice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spread of Buddhism could be a useful connection to an almost identical practice. This practice, although in a religious context and with a slightly different nature, also included two main stages of textual “transmission” – oral and written<sup>1</sup> as the ones the author identifies in his study. We indeed read a reference to the changing of religious scriptures and borrowing between Taoist and Buddhist texts mentioned in the conclusion (pp. 286-287) but it would be more inspiring if it were touched on in the first chapter, especially on page 58 where the author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two general categories of transmission – memorial/oral and written – and starts to address these categories based on a number of variation types.

Chapter two is dedicated to what, how and why the poems people in Tang China memorized. The author argue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memorization, linking it to his topic about the circulation of poetry and how memorizing can in reality alter a poem (p. 73). The chapter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several sections – extraordinary memory, ordinary memory, methods of memorization, limitation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emorization and poetic circulation. The author sets out to follow a tradition of memorizing texts, starting with examples of extraordinary memory from Eastern Han through the Six Dynasties. In this part, particularly praiseworthy is the scope of examples which come from a variety of genres including accounts from a number of sources – from dynastic histories to poems to anecdotes from short story collections (for example, *Hou Han shu* 後漢書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Jiu Tang shu* 舊唐書 “Old Tang History”, Han Yu’s “Three Encomiums on Three Worthies of the Later Han” 後漢三賢贊三首, *Sui Tang jiahua* 隋唐嘉話 “Beautiful Talk of the Sui and Tang”, *Da Tang xinyu* 大唐新語 “New Words from the Great Tang”, *Minghuang zalu* 明皇雜錄 “Miscellaneous Records of the Brilliant Emperor”, *Tang yulin* 唐語林 “Forest of Words from the Tang”). These examples being instances of rare talent in memorizing, in the next part of the chapter the author provides more arguments on how memorization was a part of the life of the educated people during the Tang. He gives an account of what they memorized – not only the texts for exams but also poetic works and text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canon. We learn that except for the purpose of exams, the other reasons were setting to memory for pure enjoyment, argumentation and interac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Discussing the methods of memorizing, in the next part the author describes examples which help us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how this process occurred in practice. He argues that such methods can be found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itself, rhyme, content (these features referring especially to primers such as *Qianzi wen* 千字文 by the 6<sup>th</sup>-century author Zhou Xingsi 周興嗣 and *Meng qiu* 蒙求) (pp. 99-100). Another wide-spread method of memorization was repetition (both reciting and copying) where the author also makes an insightful distinction between methods of memorizing practices in medieval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part on the limitations and accuracy of memory (pp. 106-117) he argues while memorizing skills were tested

<sup>1</sup> See for example 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3<sup>rd</sup> ed. (Leiden: Brill, 2007), p. 31.

in the context of exams, these skills were also part of the way to interact with a text in a broader sense, came into use in the process of composing, and did not imply (or require) an exact reproduction of a text (p. 107, 114). Finally,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emor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poetry, showing that verse was in fact one of the easiest types of texts to memorize due to it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structure, rhyme and parallelism (pp. 117-125).

The discussion on memory and ways of memorization in chapter two leads to a study the orality in Tang poetic culture in chapter three. The author starts with discussing the notions of oral literature applied by scholars to European cultures, emphasizing on how they suggest that orality was associated with illiteracy (citing Lord, p. 127), and others who argue that the oral and the written could not be that easily differentiated (citing Finnegan, 127). According to him,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 the oral and the written process went together without the one excluding the other, and that “the oral and the written were not, in any meaningful sense, in conflict in the Tang” (p. 175) which he contends to be the result of an aesthetic choice typical for that culture (p. 134). Beginning from this supposition, the author examines orality in Tang poetry by describing a process of composition, circul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poetry in the Tang, and finishes the chapter with a discussion of what this reality meant for authorial control and therefore, for possible transformation of poetic texts. Through pages 142 to 153 the author analyzes two aspects of composition of poetry: spontaneity and response to an emotional and moral stimulus, as two often cited characteristics for poetry. What I find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in this case is the fact that he connects these aspects to orality, and despite the scarcity of surviving sources, to explain the degree, nature and meaning of oral composition in the Tang, based on a number of poems and poem titles. In the part on oral circulation of poetry (pp. 153-167) the study is focused on the audience (circulation within family and circle of friends, or even the highest strata of society as an expression of a poet’s popularity), the commercial markets for poetry which both benefitted and stimulated the oral circulation, and finally concludes with what the oral transmission implies for the control over a poetic work on the part of its author. The value of this chapter, in addition to its balanced organization and well-argued discussion points, is that it provides a point of view on what the oral composition, transmission and even selling of poetic works in the Tang was like – it ultimately led to a change in the texts themselves to which Tang authors did not always object. A complex process of creating and altering of poetry is thus described which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and contribution to certain aspects of Tang cultural reality.

The next chapter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composition, transmission and change which Tang poetry underwent,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written form. The author follows the same structure used to analyze the same phenomena as when studying orality in Tang poetry. In his view the importance of written composition does not diminish the significance, or the existence at the same time, of orality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p. 183). In order to come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role writing played in the composition of poetry, he start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a number of instances where there is a description of a compositional process. Despite the scarcity of records dat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dynasty which could possibly allow us to trace such a process, the author studies the nature of writing, arguing for two different notions of it which he justifies by organizing the available material in two parts – “Spontaneity and Performance” (pp. 184-189) and “Writing as Artistic Effort” (pp. 189-192). While in oral composition orality is the process *itself*, the author observes that in writing there is a “disjunction between inspiration and the final work of art that writing allows” (p. 192). In this case, he sees writing as “a point of mediation between inspiration and expression” and thus defines one important feature of writing which distinguishes it from the oral composing of poetry. In the part of the chapter where the author discusses written circulation, which he defines as “any examples of texts circulating in written form” (p. 193) he distinguishes between several types of transmission of written poems – sending poems (pp. 195-199), inscribing poems (pp. 199-214), and their market circulation (pp. 214-221). By a careful analysis of each type he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about the nature, scope and meaning of the circulation of poems in a written form in its various manifestations – as objects sent to others, as inscriptions or as commodities. In all of these cases the author pays attention to and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the materiality of the poems which matter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nsmission and in some cases helped certain poems to survive. In addition, he also examines the different sides of the process of transmission, thus accentuating the social aspect of such a process and on how this reflects the quality and the content of the poems. In the final part of this chapter (pp. 221-235) the author delineates two methods of circulating poetry in its written form – transmitting one single copy and making multiple copies of a single poem. In this case again he analyzes the purpose of copying and the nature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as these aspects result in specific consequences as to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poems were altered. In the cases where the poet himself makes the alterations and corrections we also learn what implications this fact had for the process of composition itself, and what more important is how this fact could and should influence our ideas of a “final” form of a poem.

The fifth and last chapter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collecting, editing and copying poems into individual literary collections. It analyzes the sources for the poems in such collections, showing how some of them survived by chance before its print, when numerous copies of the same poem were not in existence, thus enhancing the possibility of variations. Thus, the process of compilation implied growing distance between the literary work and the writer. With several examples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how poems from the Early and High Tang period could be scattered and lost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including the writer’s lack of interest to preserve them or his self-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his own poetry leading him to destroy it (not clear what is meant by this highlighted part; does it mean that the writer was responsible for his poems being scattered and lost? If so, perhaps the wording could be changed to “including the writer’s own inaction (or carelessness, or lack of interest...etc.), but

also because of historical events (pp. 239-243). While this fact renders the retrieving of poems from that time was a difficult task, in later Mid- and Late Tang period the survival of poems was fortunately more common. During this time poets themselves had the habit of keeping copies of their works which could diminish the possibility of them being lost altogether. Still, despite this fact, compilers during this later time also had to face difficulties when compiling a poet's collection, including judging the numerous sources which poems came from. The analysis follows further the actual process of editing and copying, demonstrating how the literary pieces underwent change while being collected – from the criteria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choosing the poems to include in the collection to correspond to the compilers' own views, to the variety of sources they were collected from and the editorial changes that were done – in all these cases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compiling process during this time preserved valuable poetic material but it also left out a portion of it, and that also very often the poems ultimately included in such collections were actually altered in the process of copying and transmitting (pp. 248-258). Moving on to the subject of the roles individual collections played in Tang literary culture, the author identifies several of them which are connected to the very materiality of the poems as physical objects – they came into existence as a result of the writers' concern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ir own poems, sometimes even keeping them away from possible readers; they also served to preserve the poetic works by compilers who wanted to ensure their subsequent dissemination and circulation to a wider audience; they were an expression of the need to pass on copies of one's own works to one's descendants, and they also represented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anthologies which would continue to transmit Tang poetry in later periods. In the closing section of this part the author provides insights to questions of authorship and ownership, these roles of individual collections entail. While being strict in keeping their own poems in private locations and preventing them from wide circulation as physical objects, some writers would not mind these same poems being disseminated as literary works and linguistic patterns (p. 270).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chapter the author reflect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ocess of collecting of poetic works and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 collected works themselves. Based largely on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henomenon of poetry collections in the Tang and later, mainly Song, periods, he emphasizes the fact that during this time collections were not comprehensive as to the works of a given author. Rather, they represent an idea of an incomplete number of these works judged fit to be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 either by the compilers or by the writers themselves. The poems in the collections might not have represented the authentic version of the text, as people were not in the habit of gathering and compari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ame poem. In this aspect, Tang collections differed from later ones when multiple copies of one single poem would be carefully collected and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the existed versions. The author attributes this fact to difference in methods and context of collection.

The monograph finishes with the conclusion (pp. 285-294) where the author touches on the importance of reconsidering our notion of Tang poetry and of how it

was created, as this could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ways we understand, interpret, judge and value it. In the final part he opens the door to possible insights his work can have and its use in other scientific fields such as religion and history.

Viewed as a whole, this monograph is a notable accomplishment in the field of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at it succeeds in its goal of presenting and analyzing a topic as important as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poetry in an epoch known for its large body of poetic works produced. Its significanc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rough its high quality of writing and research, it manages to contribute to the studies of material history of Tang poetry by focusing on the materiality of the literary works discussed, and at the same time inspires a rethinking of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literary criticism has to these works, thus defining itself as a unique and valuable study.

《東亞的時間——歲時文化的比較研究》，劉曉峰，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四三四頁。

楊玉君，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正如作者劉曉峰在引言中所敘，中國的節日研究經常都「沿襲著節日傳說溯源，歷朝歷代節日的具體展開和具體節日習俗的描述這樣的習慣套路」（頁2）。正因類似的研究途徑已面臨缺乏新意的困境，是以作者此書開啓的新思維及新方法格外的令人振奮。作者的學思歷程，也使得這本書具有不可忽視的比較研究價值。作者畢業於中國東北師範大學，繼而留學日本，在京都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長領域為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民俗及中日歲時文化比較研究，兼治中日的學術訓練背景成為劉教授學術研究的強項，也為他東亞比較文化研究的課題打下了基礎。本書的方法論分為「比較文化的立場與方法」、「歷史學實證研究的立場與方法」、「整體論與系統論的立場」三大類，以此方法論而進行的研究，隱然可見一更遠大的學術視野，作者的理想應在於整理出一個完整的歲時文化史或歲時文化體系。本書內容收集作者歷年來發表的文章，共分為三大項，分別為「歲時文化的綜合研究」、「比較文化視野的東亞歲時研究」、及「中國古代歲時文化對日本的影響」，以下依次述評。

## 一、歲時文化的綜合研究

在首部的歲時文化綜合研究，作者以三篇論文討論中國節日之間的序列及內部結構體系。首先，在池田溫對「重數節日序列」的研究基礎上，加上定型於五至六世紀之間的「有關重數節日起源全新的闡釋系統」，劉教授重構了重數節日的形成過程，並且指出此闡釋系統富有人性化特徵，乃因其脫離了引起人們恐懼的神話傳說，而且進展到增加了倫理成分的結果。

關於古代歲時節日的內部結構體系，作者受到柳田國男對日本歲時節日的分析啟發，將完整的年度以陰陽來劃分，歸納出三種節日形成思維的途徑，即以冬至為陰的頂點、陽的起點；夏至為陽的頂點、陰的起點；年又分陰陽，以前半年為陽，後半年為陰；且一年中每個月，依其天干地支各有陰陽之屬。在此陰陽結構之下，又有幾組節日兩兩相對應，如一月七日與七月七日、上元與中元、春社與秋社、上巳與重陽等等。除了直接對應之外，作者也認為，這些節日之間還隱含著陰陽互涵的對應，並且指出來自中國思想中的陰陽五行學說是對節日內部結構造成最根本性影響的原因。接著，劉教授以統計法，分析一年中的節日排列特徵，發現中國曆法有重陽輕陰和重視陰陽發生劇烈轉換時期的特徵。

在個別節日的研究方面，劉教授考證了《十節記》的內容，認為該書為中國亡佚、流傳到日本的古籍。對上巳節的考述，作者則引用廣西壯族的民俗資料，輔以玄武、高禖及女媧的信仰特徵，推論其中的「三月三——蛇圖騰——祖先崇拜」應與上巳節的起源有關。此外，作者認為寒食節的性質屬複合性節日，有與分野學說相關的山西原邏輯，並間接促進了寒食節在唐代的興盛情形。關於端午的兩篇文章，其一考論端午與夏至的關係，其二敘述了與端午相關的蟾蜍民俗，論述內容仍然傾向以陰陽學說為主的詮釋。

筆者多年來關注歲時習俗，對作者觀察到的學界現象及所採取的節日內在結構的研究途徑，深有共鳴。筆者曾在〈節日研究架構新議〉<sup>2</sup>一文當中，提出節日之間的「橫向關係」，用意即在於提倡探討一年之中的各個節日之間的內在關聯，文中也曾提出節日與節日之間兩兩相對的現象，用詞雖與作者互異，但所指則大致相符。然而拙文只提出一初步的想法，作者學思敏捷，則更推進一步，針對節日體系提出了內在節奏的特徵。唯作者的統計方法及其取材用書，與筆者對

<sup>2</sup> 楊玉君：〈節日研究架構新議〉，《東亞文化研究》第8輯（香港：東亞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219-35。

節日發展之理解小有出入，以下試析論之。

雖然朝廷禮制也間有相對應之節假、慶典規模定例等措施，但節日基本上屬民俗現象，民間盛行之節日與官方登載之節日中間時有落差（中和節或可作為一例），除非以官方規範定期記錄當朝所過的種種節日，否則很難找到性質趨於一致，足以提供基本統計的文獻。再者，以筆者對節日習俗的瞭解，「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乃極為普遍的現象，跨區域的節日通論，勢將難以推出足以涵蓋大範圍節日情形的理論。作者據以統計的三本節日專著，南朝宗懷的《荆楚歲時記》是節日研究的基本參考書，理應納入。但第二本參考的節日專著竟然跨越上千年，一躍而至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其三更再度跨越數百年，採用了近人趙杏根的《中華節日風俗全書》。繼跨區域之後的跨朝代統計，則更令人不安。因節日歷時消長也是常見的變化，以作者熟悉的寒食節及上巳節為例，唐代寒食雖盛極一時，降至清代則已鮮有民俗實例；而上巳之「名」早已不存，其「實」也擴散在各種不同名目的節日（尤其是少數民族節日）當中。當作者使用「中國古代曆法」一詞時，實已同時忽略了各個朝代分期之間的差異。筆者以為，劉教授的統計法唯有在限定年代及地域的條件之下進行，才能有較具說服力的結論。

在對節日內涵的詮釋方面，凡治歲時史的學者，均不能忽視陰陽學說對歲時理論的影響，筆者亦不能例外。然而近年來思路亦有修正，筆者以為，若過度重視中國思想對歲時的影響，或將忽略了跨文化的自然因素與節日的密切相連。例如，在作者的節日序列裏，只著重在重數節日，未將另一脈月圓型的節日列入。不只是月圓，包含日、月、星辰等天體崇拜，都是常見的節日起源型態。且不只是寒食，許多節日都有複雜多元的來源，均應視之為複合性節日，單一起源的節日反而是少數。此外，節日與自然天候之間的關係也值得再深入探討，在〈上巳考〉一文中，作者引證富瞻的證實上巳節「極可能本來就是高禘祭祀的一種，是從祭祀比簡狄還早的創造了人類的女神女媧為中心的高禘祭祀為原點發展而來的。」（頁 115）然而，據筆者的理解，北半球的春天乃萬物復甦之時，崇拜生殖女神、生殖禮儀的祭祀是春季節日的普遍特徵，或多或少地呈現在節日習俗之中，類似的人文歷史的解釋，屬於個別文化專屬的節日敘事，其內在旨趣其實仍符合自然時序的規律。

## 二、比較文化視野的東亞歲時研究

本書第二部的比較歲時文化研究，性質上屬於節日習俗的歷史考證。有從「卯杖」、「踏歌」等物事入手，追溯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的影響的考述；也有以寒食、冬至在日本的相對不受重視為例，反推其可能原因，並提出與兩國思想差異有關的說明。兩篇與「克仗鬥石」（作者文中與「克石鬥仗」混用）相關的考證，是筆者所見關於此一特殊節俗的學術論文中，介紹最全面、分析也最深入的文章。

筆者向來以為，適度的比較文化研究可以以具有普遍性的人類思維，來理解文獻匱乏下尚難以說明的民俗現象，拙撰中也幾度採取比較研究的進路。中、日、韓三國毗鄰，文化上多有類同之處，可惜在歲時研究的領域上，有能力進行比較研究的學者終屬少數，作者在這方面投注的心力因此特別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作者在「卯杖」一物的考證上，體現出了高度的聯想力，如能再輔以更精細的辯證過程，當能成為傑出比較研究範本。然而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卯杖或脫胎自剛卯的可能性，從許多文獻事例中去說明剛卯的興衰史及卯杖的用途，卻一直無法找到足以連繫二者的證據。覽畢全文，讀者仍然感到此二者是外形迥異、材質不同、用意相異的分別物事。卯杖與稻作文化的關聯及剛卯的驅邪作用，其間除了均在正月卯日製作之外，其實並無明顯的相通處。

而〈中日踏歌考〉一文，雖然在文字上中日的用法一致，但關於踏歌一詞的定義，文中一直未有釐清。踏歌究竟專指一種有特殊步伐的樂舞，或只是連臂足踏節奏前進的歌舞泛稱（即日本另稱之「歌垣」），實足以左右此文考證的方向與結論，很遺憾作者在一開始即選擇迴避討論日本的踏歌與歌垣的關係（頁192）。作者接著引用中國的正月十五節俗，試圖找出中日踏歌之間可能的關係，並認為「中國古代的上元節有兩個根本的內容，亦即觀燈和紫姑信仰」（頁200）。據此，讀者未免生疑，所謂「中國古代」指的究竟是什麼時代？紫姑信仰見諸著錄應不早於南北朝，而同時並無正月十五張燈觀燈的記載（常見的所謂元宵張燈起源於漢明帝崇佛敕令燃燈一說實無根據）。縱觀元宵的歷史發展，習俗也不只這兩種，作者指稱它們是正月十五「根本的內容」（頁200），尚難令人信服。自紫姑信仰的討論，作者又加入了《西京雜記》「戚夫人」條的

「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連臂踏歌的線索，很曲折的論述因曆法的改變，所以入靈女廟的十月十五日其實即是正月十五日，並將靈女的身分指認為帝馨女女胥，亦即紫姑的前身。

從事比較文化研究，必須具備靈敏的思維，活潑的想像力。作者的想像力在立論假說時十分引人入勝，然而在引證支持假說這方面，他的推論過程毋寧太過大膽。我們甚至不需深入檢驗作者的推論過程，只從文章的一些慣用語，即可推知一二，例如作者行文常用「很可能」（如頁 184、186 等等），或「我認為……應當」（頁 214）、「我認為……很可能」（頁 215），推論時也經常採用開放式的「如果 A 為可能，則 B 可成立」，然後在未確定 A 的存在時，逕行確認了 B 的結果。

在考論寒食及冬至在日本的接受史時，作者的討論方式也明顯的與民俗界的研究方式有差異。作者的參考文獻，絕大多數引用中、日古籍中的歲時相關史料，至於近人的民俗學論著則似認識有所不足。以至於在論寒食不入日本時，突出了日本古代「穢」的觀念，並直指其為阻礙寒食傳入日本的原因。就作者所說明的「穢」的意涵，顯然符合瑪麗道格拉斯 (Mary Douglas) 《潔淨與危險》 (*Purity and Danger*) 一書中的「污染」相關理論，也是一種具普遍性的人類思維，在中國可輕易找到符合此概念的事例。是以，如以日本的「穢」的觀念作為寒食不入日本的原因，恐怕欠缺說服力。同時，在解釋「穢」與寒食的關係時，作者認為皇家為了保護其火之潔淨，不受污染，因此不能接受中國唐朝把火分送各家的寒食習俗。但火既然已分出去，就算受火的人家有穢，也不能反向污染分火的皇家，作者的推論令人不解。與其專注在「穢」的討論，筆者以為在〈墓與穢〉這一節中，所提及的當時日本人對直系血緣祖先的觀念淡漠一事，還更具有探討的價值。

相較之下，關於「克仗鬥石」的兩篇文章則有相當精彩材料及分析。作者指出，克仗鬥石是對天地陰陽之氣相爭的一種模仿，是以發生在正月冬春交替、端午陰陽變化激烈的時期。其目的在「通過人為的努力促進陰陽之交」，以「促進人類和萬物的繁殖，達到人畜與稼禾興旺的目的」（頁 292）。而克仗鬥石必須有人見紅受傷才算圓滿，也與「以血驅邪避邪」的概念相關。筆者更以為，若將鬥石的節俗更提高到與競賽類民俗一起作通盤的探討，則可更增進我們對於競賽類節俗本質的瞭解。

### 三、中國古代歲時文化對日本的影響

第三部的文章八篇，雖然歸在「中國古代歲時文化對日本的影響」之下，但其取材或研究方法，均與第二部的比較研究十分類似。以作者治日本史的專長，在這一部的文章中援引華文圈學者較少接觸到的日本風俗畫及古代歲時文獻等材料，允為一大特色。作者首先說明了漢曆東傳對日本的影響，再指出日本明治維新改採西洋曆的現況，為讀者瞭解日本歲時的現況打下基礎。其後依次對日本的正月、爆竹、女兒節、浴佛節、端午節等節日，進行由中國到日本的文化傳播考述。

在具體的考證細節上，作者仍然維持了上述的思路及推理特色。他認為日本正月習俗絕大多數若非直接沿襲自中國，就是自行重新組合，或是兩者之間有很大的相似，但具體傳承關係已經模糊。最後一類，作者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即日本的「大歲來客」類型傳說與中國江南地區的來訪神故事十分相似，據他「推想」很可能有淵源關係，將待進一步研究。其實，作者所推想的方向，伊藤清司在他的《中國古代文化與日本》<sup>3</sup>中已有相關成果。伊藤教授針對雲南少數民族及日本的民俗及傳說作比較研究，資料及論證很值得參考，尤其是指出彝族「撮泰吉」的祭祀，與日本來訪神的傳說密切相關。

在上巳節及端午節的考論中，作者指出了這兩個節日在日本分別是女兒節及男兒節的意義，但都點到為止，殊為可惜。除了關注從中國到日本的節日源流及習俗變化之外，作者其實更可將他所提出的節日序列及節日的內在結構，運用在探索日本節日彼此之間的關係，相信會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發現。

在少數幾處，作者未能清楚交待文獻或調查的依據，讓讀者感到些許困擾。例如提及日本關西十月「亥之子」的習俗，是孩子們將稻草束成男性生殖器的形狀來擊打地面，一邊唱祈求明年豐收的歌。劉教授斷言「這樣的作法當然最早同樣是來源於中國」（頁 348），卻未交待為何如此確信其起源。本主題的文章，或多或少流露出本位主義的氣息，亦即預設日本節俗都應受到中國的影響，然後再去找證據支持這假說。這樣的研究出發點會導致我們只注意找尋相同點，而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差異，或是對相同的事象背後更大的體系視而不見。例如，以東亞的時間而言，本書執著的面向在於認定中國民俗如何、何時影響了日本、韓國

<sup>3</sup> 伊藤清司著，張正軍譯：《中國古代文化與日本：伊藤清司學術論文自選集》（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

的歲時禮俗，而較少關注到農作生產週期與歲時慶典的結合。

本書最終章，作者省思當代中國的節日文化，指出新舊曆法交替後，傳統的時間秩序全面敗北，也象徵了東亞政治體系的敗北。其間特別突出的案例，即日本將傳統節日逐一對應的嵌入西洋曆法，並且將傳統節俗保留在新的時間體系中。同時，中國的節日序列一方面受到國家政治及商業等方面的衝擊而成立新節日，另一方面又積極復興傳統節日。中國節日文化究竟會走向復歸或超越，則有待時間來揭示答案。

《西田幾多郎の思索世界——純粹經驗から世界認識へ》，藤田正勝著，東京：岩波書店，二〇一一年。三〇八頁。

林永強，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縱向分析西田哲學的意義

本書是作者藤田正勝有關西田幾多郎的第三本專書。第一本是《現代思想としての西田幾多郎》（東京：講談社，1998年），第二本是《西田幾多郎 生きることと哲學》（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前者可以說是以西田幾多郎的成名作《善の研究》為討論的軸心，闡述西田幾多郎在現代思想脈絡中的意義；後者則是以生和哲學兩個不可分離的主題作為要旨，橫向地論述西田幾多郎的全貌。本書《西田幾多郎の思索世界——純粹經驗から世界認識へ》既不以西田幾多郎的個別著作，亦不以特定的主線闡釋西田幾多郎。作者是以縱向方式，深入討論西田幾多郎在不同時期對不同議題的思考。單從副標題「純粹經驗から世界認識へ」（從純粹經驗到世界認識）便能確認本書的進路。另外，眾所皆知，純粹經驗是西田幾多郎的起點，經過自覺、場所等哲學概念的發展，逐漸轉向「世界」。藤田在本書就是要縱向地分析西田哲學這個發展過程所包含的各個議題。

本書以「西田幾多郎之思索世界」為題，所指的是西田思考的廣度和深度。在（西田哲學）發展的過程中，西田最終想問的是甚麼呢？本書試圖

返回問題的根本及其意義，而由此出發。換言之，本書旨於清楚交代西田根本問題的所在，或在更大的關連中展現西田思考的意義，藉此打開西田哲學研究的新局面。（〈序〉，頁6）

所謂縱向分析，其意思不是指一種單向的直線論述，而是意謂具連貫性與多元性的雙向進路。就連貫性而言，西田並非單是始於純粹經驗而邁向「世界」，即因後者而改變甚或放棄前者。西田由始至終沒有離開純粹經驗此一立場，只是在不同議題上予以發揮。西田在高山岩男的著作《西田哲學》一書的〈序〉和《善の研究》三版的〈序〉清楚表示：

「自《善之研究》開始，我的思考既非出於主觀，亦非客觀，而是始於主客未分之前。對此，至今還沒有改變。」（高山岩男《西田哲學》的〈序〉，1935年3月）<sup>4</sup>

由純粹經驗至「在自覺中的直觀與反省」……透過希臘哲學而轉至「場所」的思考。……此書所言的直接經驗之世界、純粹經驗之世界，至今已轉到思考歷史實在之世界。行為的直觀之世界、製作之世界正是真的純粹經驗之世界。（《善の研究》三版〈序〉，1936年10月）<sup>5</sup>

由一九一一年《善の研究》第一版至上述引文的一九三六年《善の研究》三版序的二十六年間，西田寫了超過二百篇不同形式的文章，並出版了《思索と體驗》（1915年）、《自覺に於ける直觀と反省》（1917年）、《意識の問題》（1920年）、《藝術と道德》（1923年）、《働くものから見るものへ》（1927年）、《一般者の自覺的體系》（1930年）、《無の自覺的限定》（1932年）、《哲學の根本問題》（1933年）、《哲學の根本問題 續編》（1934年）等重要專著<sup>6</sup>。經過多年的思考和寫作，箇中雖然受到不同人士，包括京都大學的同事田邊元、學生戶坂潤、三木清和校外的學者，例如高橋里美、左右田喜一郎等批評，但西田仍然清楚表示，純粹經驗並沒有因為那些批評及其思想上的發展而改變。因此，本文所指的縱向分析，並非是單向的直線，而是具有連貫性的雙向發展。

另外，針對多元性而言，我們亦可以從以上《善の研究》三版序的引文得到確認。由純粹經驗至自覺，透過希臘哲學而轉至場所。及後更發展至行為的直

<sup>4</sup> 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新版，第十一卷（東京：岩波書店，2005年），頁281。

<sup>5</sup> 同前註，第一卷（2003年），頁3。

<sup>6</sup> 有關西田的著作年譜，詳見同前註，第二十四卷（2009年），頁180-204。

觀、製作之世界等有關歷史實在之世界的論述。這些不同的概念和議題便清楚表示了西田哲學的多元性。誠然，單從本書的目錄，西田哲學的多元性便一目瞭然。

#### 序章

第一章 根本の問い——純粹經驗とは

第二章 生と表現、そして美の問題

第三章 場所——根柢からの思惟

第四章 言葉と思索——日本語で思索することの意味

第五章 自己と他者——その非對稱性をめぐって

第六章 辯證法——西田とヘーゲル

第七章 後期西田哲學の問い——行爲的直觀とは

第八章 歴史と國家の問題

第九章 「東洋」へのまなざし——哲學と世界認識

第十章 宗教とは何か——西田哲學を貫く思惟

あとがき

問題是，作者如何透過這種縱向的分析，「清楚交代西田根本問題的所在，或在更大的關連中展現西田思考的意義，藉此打開西田哲學研究的新局面」呢？甚麼是「西田根本問題的所在」、作者如何「在更大的關連中展現西田思考的意義，藉此打開西田哲學研究的新局面」？

### 西田哲學研究的「新局面」

針對「打開西田哲學研究的新局面」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從西田哲學研究的外在（例如文獻和研究組織）和內在（例如西田哲學研究的方法、焦點與議題）兩方面分析。

外在方面，有關西田哲學的文獻，不論是日文或其他語言的，從上世紀至今，特別是一九九〇年以降，數量急增。研究西田哲學，毋庸置疑的是要把握西田的著作。自一九四七年，《西田幾多郎全集》經過數次整理出版而定稿為十九卷（以下簡稱《舊版》），至今仍然流通，並且能以相對便宜的價錢在舊書店購買。這對於西田哲學的研究幫助極大。直至二〇〇二年，竹田篤司、Klaus Riesenhuber、小坂國繼和藤田正勝四人重新編輯《西田幾多郎全集》，加入了不

少以前未曾收錄的資料，並由十九卷增至二十四卷，於二〇〇九年完成（以下簡稱《新版》）。《新版》不單在量方面有所增加，更與《舊版》的編排有所不同，頁碼迥異。在沒有提供對照表的情況下，令不少沿用《舊版》的人大感不便，特別是多年來西田哲學的研究皆以《舊版》為本。《西田幾多郎全集》經過超過半個世紀的變遷，其流通性和完整性亦有所提高，這無疑為西田哲學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獻基礎。西田哲學研究的發展，與《西田幾多郎全集》的編製工作不無關係。

另外，西田幾多郎的原著不單以「全集」形式出現，更有易於攜帶，價格相宜的「文庫版」。除了暢銷的西田名著《善の研究》外，上田閑照編集的《西田幾多郎哲學論集I、II、III》（東京：岩波書店，1987-1989年）等的「文庫版」皆對西田哲學的教研有莫大裨益。及後由上田閑照監修、大橋良介和野家啓一以不同哲學主題編輯共有九卷的《西田幾多郎選集》（京都：燈影舍，1998年）等，皆能推進西田哲學的研究。

不單是日語，多種不同語言的西田原著翻譯和編輯，亦為推動西田哲學研究提出了堅實的文獻基礎。過去數十年，日本名古屋的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致力推動日本哲學的研究，出版不少有關西田哲學的書籍。該研究所的 James W. Heisig、美國學者 Thomas P. Kasulis 和 John C. Maraldo 更耗費多年，編了一本超過一千三百頁的日本哲學資料集 *Japanese Philosophy: A Sourcebook*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這使得西田哲學進一步走上「國際化」，不讓其封閉於日本和日語世界<sup>7</sup>。

除了文獻，一些有關西田哲學研究的組織亦相繼出現。例如在一九九五年，京都大學文學部成立世界第一個、至今仍然是唯一專研日本哲學的「日本哲學史」專修。本書作者由專修成立至今，擔任系主任和教授。不單在研究方面，例如上述《西田幾多郎全集》的新版、三本有關西田幾多郎的專書等大量研究文獻的出版外，學部和研究生的培訓也是功不可沒。多年來世界各地有志研究日本哲學，包括研究西田哲學的學生和學者紛紛慕名而至。各式各樣的研究計畫和學術活動亦使得西田哲學廣泛受到學界關注。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八至十九日在京都

<sup>7</sup> 有關這本日本哲學資料集的編著過程，詳見 James W. Heisig, "Japanese Philosophy: A Sourcebook. The Story Behind the Project," *Bulletin of Nanzan Institute for Religion and Culture* 35 (2011): 9-23. 日語版：J・ハイジック：〈日本哲學資料集——プロジェクトの背景を語る〉，《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所報》第21號（2011年），頁11-22。

大學舉行的「《善の研究》出版百周年紀念國際研討會」，就有來自世界各地研究西田哲學的學者作報告，吸引超過二百名聽眾，盛況空前。這些活動皆令人明白瞭解西田哲學研究日益蓬勃。

除了京都大學日本哲學史研究室和南山大學的宗教文化研究所外，二〇〇三年成立的西田哲學會亦是一個讓西田哲學研究飛躍的促因。西田哲學會，顧名思義是以推動西田哲學研究的學會。它不單匯聚了研究西田哲學的學者，更歡迎所有關心西田哲學的人士加入會員。這對西田哲學的普及化幫助極大，而對西田哲學相關著作的渴求亦產生實質性的正面作用。每年一度的學術大會更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交流平臺，會報所刊載的論文更讓西田哲學進一步「專業化」。自二〇〇八年，大會更增設外語（日語以外）的分場報告，這成爲西田哲學「國際化」的另一催化劑。

針對西田哲學的研究，上述的「外在」因素無疑爲開拓作者所言的「新局面」建立穩固的基礎。更重要的是，作者透過本書進一步充實其「內在」的哲學討論。西田的著作，堪稱難解，面對繁多的西田哲學研究文獻，本書在那些地方仍能開拓「新局面」呢？我們或許可以從以下三方面簡述之。

首先，相較不少有關西田哲學的專書，本書的內容無疑比較深廣。如目錄所示，作者從純粹經驗、美學、場所、語言、自己與他者、辯證法、行爲的直觀、歷史與國家、東方與世界、宗教等主題分析西田哲學，大致勾畫了西田哲學的全貌。這不單包括所謂西田哲學不同分期的主要關注，更從「根本」闡述各種議題，深入剖析西田的見解。環顧多種西田哲學的專書，能兼備深廣兩者的著述實在不多。例如我們翻閱被譽爲京都學派第三代成員、京都大學名譽教授、西田哲學會首任會長上田閑照有關西田哲學的專書：《西田幾多郎を續む》、《西田幾多郎とは誰か》、《經驗と自覺》、《場所》等，大部分集中討論西田的純粹經驗、自覺和場所<sup>8</sup>。其他如西谷啓治、高山岩男、三木清、下村寅太郎、竹內郎知、中村雄二郎、花岡永子、小坂國繼、氣多雅子等有關西田哲學的日語和 Robert Carter、Robert Wargo、Yusa Michiko、Robert Wikinson 等日語以外的專書，雖各具特色，但論深度廣度，本書確實卓然有成。

其次，本書部分篇章的論述無疑是開拓了西田哲學研究的「新局面」。例如

<sup>8</sup> 上田的著作除了可見於共十一卷的《上田閑照集》（東京：岩波書店，2001-2003年）外，亦可參考其近作《折々の思想》（京都：燈影舎，2010年）與八木誠一合著的《イエスの言葉/禪の言葉：對談評譯》（東京：岩波書店，2010年）等。

第四章有關以日語作哲學思考的分析，特別是與西田哲學的關係，可說是嶄新嘗試。誠然，有關日語與哲學思考的考察，除了本書第四章提及的和辻哲郎、九鬼周造和第一章論及的木村敏（頁 36-40）等外，坂部惠亦是當中的表表者<sup>9</sup>。可是，他們的分析沒有深入地與西田哲學，包括本書提及的西田場所論作比較。這一點不單是涉及西田哲學研究的「新局面」，亦是西田哲學本身，以致日本哲學的「根本」問題。西田一再強調要脫離西方哲學主客二分的框架，這一點與日語在主語和述語問題上的「獨特性」不無關係。另外，第九章有關西田對「東方」的分析亦別具心思。近年有關西田對「東方」和東方哲學的探討屢見不鮮。可是，本書的作者並非旨於指出兩者的異同，或從「東方」與「西方」的對立角度展現西田有關「東方」和東方哲學的論述，而是強調如何在「傳統」中創新（頁 271）。後期西田的關注轉向「世界」，目的不是在「世界」的框架下，強調「日本」和「東方」的「獨特性」，而是試圖展現「歷史實在之世界」（歷史的實在の世界）的理論（頁 271）。作者強調，從比較的角度研究西田哲學時，重點不是凸顯各自的「獨特性」，而是箇中所含的普遍性理論或「新的可能性」（頁 271）。

第三個值得我們留意的面向是：藤田對文獻和哲學兩方面的掌握，皆使得本書能達致「新局面」。例如第八章有關西田對歷史和國家的看法，藤田以極其細緻的文獻研究，強調要以「當時」西田所思考的，從文脈與政治狀況理解西田每一個發言，及其箇中的意圖和本質（頁 196-197）。眾所周知，上田閑照亦曾對西田有關歷史和文化進行深入的討論。他同樣指出，在研探西田有關歷史、文化和那場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時，我們要尋回「當時」的狀況，而有關西田的解讀其實是一場「意思上的爭奪戰」（意味の爭奪戰）<sup>10</sup>。雖然藤田與上田的立場相近，但仔細閱讀兩者的文章，不難發現前者在文獻研究的細緻度與哲學分析兩方面，皆能為西田有關國家和歷史的論述開拓「新局面」。例如，對所謂「當時」狀況的闡釋，藤田從西田的書簡、日記和其他文章，詳述西田如何面對「當時」的時局（頁 194-195）。對西田有關「當時」狀況的公開發言，特別是對西田曾經參與的「教學刷新評議會」這個組織，藤田的文獻研究確實

<sup>9</sup> 參坂部惠：〈日本哲學の可能性〉，藤田正勝編：《知の座標軸——日本における哲學の形成とその可能性》（京都：晃洋書房，2000年），頁 181-200 等的著作。

<sup>10</sup> 上田閑照：《西田幾多郎とは誰か》（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頁 238-244。這是上田閑照：〈西田幾多郎——「あの戦争」と「日本文化の問題」〉（《思想》第 857 號 [1995 年 11 月]，頁 107-133）一文的撮要。

比上田更加細密（頁 195-202）。至於哲學論述方面，上田雖然對西田有關「大東亞共榮圈」、「世界新秩序」、日本文化和日本對上以議題的角色等皆有所論，但藤田對西田反對日本文化中心主義的哲學觀點的由來，包括 Alois Riegl 的藝術論和 T. S. Eliot 對「傳統」的見解，都有較詳細的交待（頁 210-215）。至於國家、「世界新秩序」、國體等議題，藤田亦作了相對較仔細的分析，例如西田在國家存在理由的議題上是如何受到 Friedrich Meinecke 對國家之見的影響（頁 219-222）等。這些高度的文獻考察和哲學論述，不單顯露作者本身的學術涵養，更為西田哲學研究開出實質性的「新局面」。

### 從西田哲學到日本哲學

作者在本書的跋表示：「希望本書能成為今後西田哲學研究，以致日本哲學研究的基礎」（頁 298）。本書以縱向分析，透過極其細緻的文獻和哲學探究，展現西田哲學的連貫性和多元性。作者雖未對西田哲學的某些議題，例如倫理、科學、數學等有所觸及，但亦足以呈現西田哲學的深廣度。從這一點看，本書或許可以成為西田哲學研究的基礎。至於對日本哲學研究的意義，這方面的評價委實超過筆者的能力。但值得一提的是：如〈序〉所示，本書試圖「在更大的關連中展現西田思考的意義」。此處所言的「更大的關連」或許是指不同的哲學傳統、方法和議題等的「內在」元素。但如要進一步鞏固「日本哲學研究的基礎」，一些「外在」的元素亦值得深思。例如文獻的質量和研究組織，甚至「日本哲學」的學術定位是否應該進一步強化等問題。

文獻方面，不論在翻譯、論文和專著等的質量仍有不斷優化的空間。James W. Heisig、學者 Thomas P. Kasulis 和 John C. Maraldo 的編著 *Japanese Philosophy: A Sourcebook* 無疑對日本哲學的教研具有不可或缺的歷史和學術意義，但往後還有很多工作，才能進一步鞏固「日本哲學研究的基礎」。首先，「日本哲學」的合法性問題或許仍然懸而未決。如果我們視「日本哲學」為一個出現於日本這個地方而具有原創性的哲學運動，並從而產生一些跨文化的哲學對話，那麼它或許應該與其他相對較被認定的學術領域 (academic discipline)，例如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等，同樣受到高度重視。

近年，藉著京都大學的日本哲學史專修、南山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和西田哲

學會等研究組織的大力推動，「日本哲學」已廣被認識。本書作者所主持的日本哲學史論壇（日本哲學史フォーラム），《日本の哲學》、《日本哲學史研究》等以日語為主的學術和出版活動，無疑讓「日本哲學」的認受性有所提高。但如能進一步推廣至日語以外的世界，則相信可以進一步強化「日本哲學」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對此，就如其他哲學的學術領域一樣，一本國際性的學術期刊和一個國際性的學會，似乎是可取，甚或是必要的做法。其目的並不止於形式上團結「日本哲學」的學者，更重要是透過這些學術上的「外在」元素，進一步提高「日本哲學」的「內在」質素。另外，對於一群致力「日本哲學」研究的年青學者，國際性學術期刊相信有助他們提高研究的質素，從而培養更多相關的專業人材，強化整個「日本哲學」的學術領域。而國際性的學會將有助推動「日本哲學」的發展，例如學術期刊的編製，定期舉辦一些「日本哲學」的學術研討會等。簡言之，如要達成作者所言的「日本哲學研究的基礎」這個願景，這或許不是單靠一本著作或哲學討論本身的「內在」元素，一些能讓「日本哲學」有「更大的關連」的「外在」結構亦不容忽視。這亦是關心「日本哲學」、以至哲學本身的每一個人，包括中文學界皆必須加以關注。

### 中文學界有關西田哲學的研究

針對所謂「新局面」的願景，我們或許需要檢視中文學界有關西田哲學的情況。相對於日本和歐美有關西田哲學的研究，中文學界仍有不少發展空間。雖然在翻譯方面，特別是《善の研究》早在一九二九年已出版第一個中文譯本（魏肇基譯，上海：開明書店），相對於一九六〇年出版的首個英譯本（V. H. Viglielmo 譯，東京：Japanese Government Printing Bureau）確實早了三十年的光景。而第二個中文譯本則於一九六五年出版（何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相對於一九九〇第二個英譯本（Abe Masao 與 Christopher Ives 譯，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亦早了三十五個年頭。就《善の研究》的其他語文翻譯，亦可謂快人一步。可是，這只侷限於《善の研究》，西田其他著作的翻譯、相關研究的專著和論文的質量，近年雖有冒起的徵兆，但仍有待發展。例如西田哲學的專書，至今還是只有一九六三年劉及辰的《西田哲學》，相關的翻譯和論文雖日漸增多，除了為人熟知的吳汝鈞、卞崇道等人的著作外，近年黃文宏、吳光

輝、張政遠、廖欽彬等亦寫了不少有關西田哲學的文章<sup>11</sup>。但由於研究人數還沒有大幅增加，相信往後仍有待各方的努力。

《二十世紀中國人物傳記資料索引》，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共四冊，六一九二頁。

林慶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傳記是研究一位人物不可或缺的資料，是以自古史學家皆很重視傳記資料，司馬遷的《史記》，傳記資料就佔了大半。歷代正史也都沿用這種體例。後來傳記從史書中獨立出來，各種體裁的書都有傳記。傳記資料一多，讀者要上山下海去搜尋，煞是辛苦。如能把傳記資料的條目編成索引，可節省不少搜尋的時間。

民國初年哈佛燕京學社曾編印《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遼金元傳記三十種綜合引得》、《八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和《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等四種人物傳記索引。因為檢索方法不方便，且所收資料不夠多，不久就被淘汰。現在，最方便使用的傳記資料索引是《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但是，傳記資料越來越多，讀者根據索引仍舊要到處查詢，頗為不便。如果將傳記資料編成一大叢書，可節省讀者不少時間，周駿富主編的《清代傳記叢刊》和《明代傳記叢刊》就是因應這個需求而出版。

以上所說的都是清代以前的傳記資料索引，民國以來的人物可能更多，傳記資料的分布可能更廣，亟需要一本傳記資料索引來統攝繁雜的傳記資料，

<sup>11</sup> 有關中文學界西田幾多郎研究的文獻目錄，可參卞崇道：〈中國語文獻目錄〉，藤田正勝編：《西田哲學選集 別卷二：西田哲學研究の歴史》（京都：燈影舎，1998年），頁578-579。卞崇道、吳光輝：〈日本哲學についての中國語研究文獻目錄〉，《世界の中の日本の哲學》（京都：昭和堂，2005年）頁ii-iv。近年，張政遠、黃文宏、吳光輝等除了寫了一些西田的相關論文，亦有一些有關日本哲學和京都學派的概論。例如張政遠：〈日本哲學試論〉，《修遠之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系慶論文集：同寅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77-391，張致遠：〈中國語圈における日本の哲學〉，J. W. ハイジック編：《日本哲學の國際性——海外における受容と展望》（京都：世界思想社，2006年），頁239-260、黃文宏：〈京都學派哲學在臺灣的研究與發展〉，未刊稿。吳光輝：〈「哲學之道」將走向何處？京都學派哲學研究的動態與斷想〉，未刊稿等。而廖欽彬的研究主要是田邊元，但亦有與西田哲學相關的文章，例如廖欽彬：〈關於西田哲學與田邊哲學的「逆對應」〉，未刊稿。

一九七三年國立中央圖書館曾編輯《中國近代人物傳記資料索引》，但因收錄資料不夠多，且有許多錯誤，並未發生影響力。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王明根主編的《辛亥以來人物傳記資料索引》，民國以來人物傳記資料的檢索才有比較好的工具書。

本索引仍舊是王明根主編，共有四冊，收錄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九九年，一百年間有過傳記資料的人物共有四萬八千多人，除著重收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思想界的知名人物外，還收錄了華僑和少量中國籍外國人的傳記資料。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為《辛亥以來人物傳記資料索引》的修訂本，收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這段時期人物的傳記資料。下編將收錄人物的上限從一九一一年向前延伸到一九〇〇年，下限從一九四九年向後延伸到一九九九年，包括新中國成立後成名的人物。

本索引收錄資料條目，多達二十餘萬條，要檢索二十世紀中國人物的傳記資料，非利用本索引不可，光是這一點，就可以知道本索引的重要性。但如果仔細審視仍可發現不少缺點，茲舉失收人物和失收資料兩點來談：

## 一、失收人物

本索引雖已收四萬八千多位二十世紀人物的傳記資料，但應收入而被遺漏掉的人物仍有不少。例如：羅倬漢(1898-1985)是廣東興寧縣人。一九一九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攻讀外國哲學。一九二五年畢業後曾任教於北京、興寧、廣州諸中學。一九二七年曾擔任興寧縣縣長。一九三三年，東渡日本，就讀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攻讀歷史和哲學。抗日戰爭爆發後回國，先後擔任桂林師專、雲南澂（澄）江中山大學師範學院、成都女子文理學院、廣東省立文理學院等校教授。一九四九年後，任教於廣東省立文理學院、華南師範學院，擔任二級教授、歷史系主任，直至一九六〇年退休。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二日病逝於廣州，享年八十七歲。羅氏的主要著作有早年所著之《詩樂論》、《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而本索引第四冊所收入的，卻是個同名同姓的軍人羅倬漢<sup>12</sup>，其實學者羅倬漢的傳記資料也不難找，在《興寧文史》第五輯和第十六輯都有懷念他的文字，茲臚列重要篇章如下：

<sup>12</sup> 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編：《二十世紀中國人物傳記資料索引》，第4冊，頁1819。收入「羅倬漢(1901-)陳子歡編著 黃埔軍校將帥錄第1001頁」一條。

1. 林鈞南：〈緬懷羅孟瑋教授〉，《興寧文史》第五輯（1985年11月），頁一五八—一六〇。
2. 陳子川：〈悼羅孟瑋師〉，《興寧文史》第五輯（1985年11月），頁一六二。
3. 何國華：〈正直愛國的學者羅倬漢教授〉，《興寧文史》第十六輯（1992年9月），頁八〇—八八。
4. 魏啓清、萬福友：〈眷眷學子心〉，《興寧文史》第十六輯（1992年9月），頁八九—九二。
5. 郭夏：〈說「曼陀羅書」〉，《興寧文史》第十六輯（1992年9月），頁九三—九四。
6. 陳斌：〈歷史系設立「羅倬漢獎學金」〉，《興寧文史》第十六輯（1992年9月），頁九五。

當然，二十世紀中國人物那麼多，遺漏幾個算不得甚麼大缺點，但如果各個領域的重要人物都有失收，那就說不過去。像柳存仁先生是研究道教和古典小說的權威，本索引沒有收錄他的資料，大概以為柳先生後半生並非中國籍。

## 二、失收資料

本索引號稱收入中文傳記資料二十多萬條，取材於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九九年，中國出版的中文專著、論文集、報刊、年鑑、索引、百科全書和文史資料等。但是，還是有不少傳記資料沒有收錄進去，例如：龔道耕的傳記資料，本索引第一冊收入三條（頁2049）：

1. 〈龔向農先生傳略〉 潘慈光  
《圖書館館刊》一九六四年一卷三期  
《四川文獻》一九六四年十九期  
《民國四川人物傳記》 第二一九頁
2. 〈記龔向農先生〉 龐俊  
《四川文獻》一九六七年六十一期
3. 〈龔道耕(1876-1941)〉 關國煊  
《傳記文學》一九七九年三十五卷五期

《民國人物小傳》 第四冊 第四三二頁

第一條出處刊名《圖書館館刊》，應作《國史館館刊》，出版年一九六四年應作一九四八年。第四冊收龔道耕傳記資料兩條（2559 頁）：

1. 〈成都龔向農先生墓誌銘〉 龐俊  
《廣清碑傳集》第二十卷第一三八九頁
2. 〈記一代經學大師龔向農先生〉 唐振常  
《文史雜誌》一九九〇年四期

兩編所收傳記資料合計才五條，但根據筆者的瞭解，龔道耕的傳記資料至少有十幾條。一九四二年六月出版的《志學》第六期曾編輯「龔向農先生逝世紀念專號」，該專號收有悼念龔道耕的文章多篇：

1. 龐石帚：〈記龔向農先生〉
2. 龔讀籀：〈先王父向農府君學行述略〉
3. 徐仁甫：〈龔先生著述目錄〉
4. 李雅南：〈記龔向農先生文〉
5. 輓詩
6. 輓聯

此外，當代學者撰寫有關龔道耕的傳記資料還有：

1. 龔師古：〈先祖父龔向農生平簡述〉，《成都志通訊》，一九八六年四期。
2. 周積厚：〈龔向農先生生平事略〉，《金牛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1987 年）。
3. 朱旭：〈龔道耕〉，《四川近現代人物傳》第四輯，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4. 姜亮夫：〈學兼漢宋的教育家龔向農〉，《四川近現代文化人物》，成都市：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sup>13</sup>。

以上的資料條目都為本索引所失收。又如：孫德謙 (1869-1935) 的傳記資料，本索引第一冊收入兩條（頁 658）：

1. 〈孫隘堪年譜初稿〉 吳丕績  
《學海》一九四四年創刊號、一九四四年一卷六期

<sup>13</sup> 姜亮夫此文又改題目為〈龔向農先生傳〉，刊於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第 6 卷（1995 年），頁 286-294。

2. 〈孫德謙(1873-1935)〉何廣棧

《傳記文學》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卷二期，《民國人物小傳》第三冊第一五〇頁

第三冊也收入兩條（頁 856）：

1. 〈孫德謙的目錄學思想〉 柯平

《武漢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三期

2. 〈清故貞士元和孫隘堪先生行狀〉 王籟常

《廣清碑傳集》第十九卷第一三一四頁，《民國人物碑傳集》第六三〇頁兩編合計四條。其實，孫德謙的相關傳記資料不僅只這四條而已，由於孫氏生前曾任大夏大學教授，在他過世後，《大夏周報》就不斷有為他開追悼會的消息，也有圖書館收購他珍藏圖書的消息<sup>14</sup>。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版的《大夏周報》十二卷九期有「追悼孫德謙先生專號」，刊有十餘篇哀悼性質的文字。另外，後人的研究論著中也有一些傳記資料可參考，如：

1. 學術世界編譯社：〈撰述人傳略：孫德謙〉，《學術世界》第二卷一期（1936年7月）。
2. 錢基博：〈孫德謙〉，《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編，香港：龍門書店，一九六五年，頁一一五—一二六。
3. 馮永敏：〈孫德謙先生論讀書〉，《孔孟月刊》第二十七卷六期，一九八九年二月，頁三十五—三十九。
4. 余崇生：〈孫德謙與《六朝麗指》〉，《國文天地》第十二卷八期（1997年1月），頁四十一—四十四。

其他人物多多少少都有失收的資料，因為資料是無所不在的，而找資料的人卻有不可克服的侷限，誠如莊子所說：「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所以，失收資料如果不是太離譜，應是情有可原。

本索引最可議的一點，是把以前出版過的《辛亥以來人物傳記資料索引》收錄為第一冊、第二冊。根據本索引的編輯說明，這第一冊、第二冊是《辛亥以來人物傳記資料索引》的修訂本，但修訂的幅度有多大，〈編輯說明〉中未詳加說明。許多讀者以為本索引四冊都是新的資料，所以定價一五八〇元人民幣，勉強還能忍受，沒想到打開一看，有一半是舊書重印。如果買過《辛亥以來人物傳記

<sup>14</sup> 見〈圖書館收購孫德謙教授藏書國學珍本千餘冊〉，《大夏周報》，第12卷8期（1935年12月），頁168。

資料索引》的人，等於有一半重複，這重複的一半，也增加讀者一半的負擔。不然，如果僅有後面兩冊，定價應該不會那麼高。以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商譽，竟有這種做法，實在令人不解。當然，本索引新的資料雖只有一半而已，仍花費編者不少時間和精力，讀者在使用時仍然會相當感激。